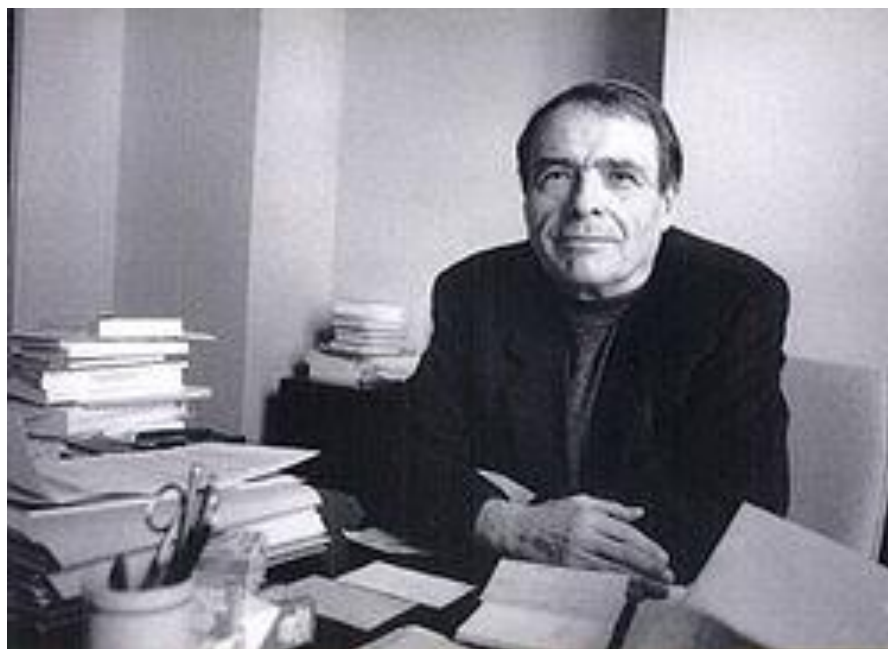


## 君特•格拉斯、布林迪厄對談：“進步的”復辟

2015-12-26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近代文學研究”



德國小說家與法國社會學家就新自由主義把政治倒退成功地變成社會進步的標準，以及就啟蒙運動在歐盟中這兩大文化的命運交流意見。

皮埃爾·布林迪厄(1930-2002 年)的逝世，使世界失去最著名的社會學家，使歐洲左派失去過去十年來最激情和權威的聲音。終其一生，其著作的主題都是不平等——他的作品可以被視為對不平等的各種形式以及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次長期研究。在政治上，布林迪厄總是站在左派一邊。由於厭倦了密特朗執政期間社會黨政權的經驗，他的作品在 20 世紀 90 年代愈見激進。1993 年，他在《世界的貧困》中對法國社會主義所建立的新自由主義秩序給人類造成的後果做出嚴重指控，這是態度轉變的標誌。他是一個有針對性的干預組織“有理由行動”的始創者、“左派的左派”的鼓動者、主張形成一場歐洲社會運動的宣導者，他在最後幾年對法國傳媒的腐敗和法國知識界的墨守成規做出一連串猛烈的抨擊，並招惹法國知識界的仇恨。

當代聯邦德國重要作家君特·格拉斯曾從事過各種職業，先當農業工人，學習過石雕和造型藝術，後成為職業作家、雕刻家和版畫家。他是“四七”社成員，政治上支援社會民主黨，主張改良。在 1970 年社會民主黨上臺執政時，曾積極投入支援勃蘭特競選的活動。他的政治態度和作品中過多的色情內容曾在國內外引起過不少批評。1959 年問世的長篇小說《鐵皮鼓》使他獲得世界聲譽。除了《鐵皮鼓》之外，格拉斯還以他兒時曾經生活過的波蘭格但斯克為背景寫出了《貓與狗》、《狗年月》以及《比目魚》等小說，以此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個首先被希特勒點燃二戰戰火的地方。格拉斯的作品語言之新穎，想像之豐富，手法之獨特使他在當代世界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

下麵是布林迪厄在 1999 年與格拉斯的對談，這次對談讓我們對布林迪厄在政治上的不妥協有所瞭解。在這個被認為已不可能再出現左拉和薩特的年代，他成為他們的傳人。

格拉斯：一個社會學家和一個作家坐在一起討論問題，這在德國很不尋常。在德國，哲學家坐在一個角落，社會學家坐在另一個角落，作家則在後房爭吵。我們這樣的交流是少有的。然而，當我想到你那本《世界的貧困》，或我的近作《我的世紀》，我看到我們的著作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從低處講故事。我們不站在人們的頭上或從勝利者的立場講話；我們在各自專業的裡以站在失敗者一邊而聞名，站在那些被排斥者或社會邊緣者的一邊。

在《世界的貧困》中，你和你的合著者們壓抑了你們自己的個性，把焦點集中於理解，而不是高人一等的知識這個概念——一種有關法國社會情況的觀點，它肯定也適用於其他國家。作為一個作家，我真想用你們的故事當原材料——例如，對於“長壽花街”的描寫，在那條街，通常第三代的金屬工人現在都失了業，

被排斥在社會以外。在對工作場所的描寫中，社會問題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不必訴諸口號。我非常喜歡。我真希望我國有像這樣一本關於社會關係的書。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應有一本。也許應有一整個圖書館，收藏各種對政治失敗後果的詳盡研究——如今政治已完全被經濟取代了。我心中惟一的問題也許與一般的社會學訓練有關：這類書籍裡沒有幽默。在我的故事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失敗的喜劇在這裡沒有一荒誕產生於某些對抗。為什麼這樣？

布林迪厄：從那些有親身體會的人那裡直接記錄這些經驗，本身已令人難以抑制，保持距離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我們覺得有義務從書中略去若干記述，因為它們太慘了，充滿悲傷或痛苦。

格拉斯：當我說幽默的時候，我的意思是說悲劇和喜劇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兩者的界線是流動的。

布林迪厄：我們想讓讀者在一種原始的、未加修飾的形式中看到這種荒誕。我們對自己提出一個指示——避免文學性。你也許會覺得震驚，但是面對這樣一些戲劇性的場面，總有一種想寫得出色的誘惑。梗概盡可能寫得無情地直接，以便回到這些故事本身那種極端的、幾乎難以忍受的暴力。有兩個理由：一個是科學的，另一個我想是文學的，因為我們要的是非文學性，以便達到通過其他手段獲得的文學性；還有一些政治上的理由：我們相信歐洲和拉美以及很多其他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精心裝飾起來的暴力是如此強大，以致你根本無法用純粹的觀念分析來瞭解它。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批判，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後果簡直沒法相比。

格拉斯：這反映在你們的書中——採訪者常常被他得到的回答嚇得目瞪口呆，以致老是重複自己或是思路被打斷，因為對方正在講述的事情，是以內心受苦

的力量表達出來的。採訪者沒有干涉，以突出他的權威，或強加他的意見，這很好。但是，也許我應再解釋一下我先前提出的問題。我們兩個——你作為社會學家，我作為作家——都是啟蒙運動的後代，這個傳統在今天，至少在德國和法國，正被質疑，仿佛歐洲啟蒙運動的進程已失敗了或中止了，仿佛我們現在沒有它也可以繼續。我不同意。我看到啟蒙運動的進程中有缺陷，有不完整的發展——例如，把理性縮減至純粹技術上可行的東西。它開始時出現的很多想像力的模式——這裡我想到蒙田——已丟失了數百年，其中包括幽默。例如在伏爾泰的《老實人》或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這兩本書中，當時的環境也是可怖的，然而，卻還保存著那種表現一個滑稽人物、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個勝利人物的能力，即使是通過痛苦和失敗。我相信，啟蒙運動脫軌的跡象之一，是它忘記了如何笑，忘記了即使痛苦也能笑。在其進程中，失敗者的勝利笑聲被丟失了。

布林迪厄：但是，在失去啟蒙運動的傳統這一感覺與新自由主義視野的全球性勝利之間，有著某種聯繫。我把新自由主義視為一種保守革命，這個術語在德國的兩場戰爭期間被使用過——這是一種奇怪的革命，它恢復過去，卻把自己打扮成進步，把倒退本身改變成進步的一種形式。它做得如此好，以致那些反對它的人反而被弄成倒退者。這是我們兩個都在忍受的處境：我們隨時要被當成過時者、“曾經”者、倒退者……

格拉斯：恐龍……

布林迪厄：正是如此。這就是保守革命、“進步的”復辟的巨大力量。就連你今天說的一些話也受其影響——我們被告知，我們缺乏幽默。但是時代沒趣極了！真的沒有什麼好笑的。

格拉斯：我並不是說我們生活在快樂時代。文學引發的地獄般的笑，是抗議我們生活中的環境的另一種方式。你談到保守革命，今天以新自由主義面目兜售的東西，無非是重返 19 世紀曼徹斯特自由主義的老方法，它相信歷史是倒回的。在 50 年代、60 年代，甚至 70 年代，歐洲各地相對成功地嘗試使資本主義變得開化。如果我們假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啟蒙運動的機靈、任性的孩子，他們都可被視為對彼此實施一定的制約。就連資本主義也被迫接受和承擔一些責任。在德國，這被叫做社會市場經濟，就連基督教民主黨人之中，也存在一種諒解，即不能允許再出現魏瑪共和國的情況。這種共識在 80 年代初期崩潰了。自共產主義統治集團崩潰以來，資本主義一改裝成新自由主義—感到它可以跟暴亂賽跑，仿佛失控似的，再也沒有與之抗衡的東西。今天，就連剩下的少數負責任的資本家也舉起警告的手指，因為他們看著工具脫離他們的控制，看著新自由主義重複共產主義的錯誤—發表信仰文章，否認自由市場有任何改變，宣稱絕無過失。天主教徒也以他們的某些教條走這條路，就像中央委員會的官僚較早時做的那樣。

布林迪厄：沒錯，但是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在於這個事實，也即它是由那些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實施的，至少在歐洲是如此。施羅德、貝理雅、若斯潘全都乞靈於社會主義，以便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使得批判性的分析遇到極端的困難，因為所有辯論的術語都再次被掉轉過來。

格拉斯：已開始向經濟屈服了。

布林迪厄：與此同時，也很難對各個社會民主黨政府中的左派採取批判性的立場。在我看來，我們面對的其中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是如何在國際範圍創造一股反對力量，反對各社會民主黨政府中的左派，這樣就有可能對他們施加真

正的影響。我們作為知識份子可以為這場運動貢獻什麼：這種運動絕對是根本性的，因為——與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相反——從歷史角度看，所有社會進展都來自積極鬥爭。因此，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經常被稱為“社會歐洲”的東西，我們就需要一場歐洲社會運動。我相信知識份子有重大責任去幫助形成這樣一場運動，因為處於支配地位的制度的力量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知識的——存在於信仰的王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敢說敢言：恢復對一種烏托邦可能性的意識，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勝利之一就是扼殺這種意識，或使它看上去像過時的。

格拉斯：或許也因為各個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本身也部分地相信共產主義的消亡便意味著社會主義消失這一論點。他們已失去對歐洲工人運動的信仰，而事實上歐洲工人運動存在的時間遠比共產主義長。離開自己的傳統是投降的一種形式，導致與諸如新自由主義這種自稱符合自然規律的東西調和。

與此同時，很多知識份子吞下一切，但從中得到的只是憤慨。這就是為什麼我懷疑不能只靠知識份子。在我看來，身為知識份子並不能擔保質素。對法國的情況，我只能猜測，但是在德國，有些人在 1968 年相信自己遠比我左傾，而現在我甚至必須把我的頭扭到右邊來看他們——準確地說，我看到的是極右。

布林迪厄：《世界的貧困》尋求給知識份子分配一項要比他們所習慣的職能溫和得多但也有用得多的職能。就我在北美所見而言，公共作家是一個可以寫作並把其技巧傳授給別人的人，表述他們比他更清楚的東西。社會學家的位置非常特別。他們跟其他知識份子不同，因為他們之中大多數普遍懂得如何傾聽和解釋別人對他們說的話，把它記錄成文字，再傳播開來。這種工作預先假定一種在知識份子中間難得一見的能力，這就是去除他們常有的自我中心和自戀。

格拉斯：不過，與此同時，你又得向同情新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發出呼籲。我注意到，在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這個範圍內，有那麼一兩個人，他們要麼由於他們的知識份子性格，要麼由於他們受過啟蒙運動傳統的訓練，開始懷疑金錢在全球如此不受約束地流通，從新自由主義內部爆發出來的這種瘋狂，是否應不加反對地任由繼續下去：例如沒有理性或目標的合併潮，往往造成兩三千或一萬人失去職位；股市只反映利潤的極大化。我們需要與這些懷疑者對話。

布林迪厄：不幸地，這個問題不只是抗衡某種被精心打扮成人人認同的智慧的主導論述那麼簡單。要有效地打擊它，我們必須有能力擴散和傳播一種批判性的論述。例如，我們在電視上對話，目的是要影響知識界以外的公眾。我要在這面沉默的牆上打開一個缺口——因為它不只是一道金錢之牆——但電視是一種非常模糊的東西：它既是使我們得以說話的工具，又是使我們不能說話的工具。我們永遠都被主導論述入侵和圍攻。絕大多數新聞從業者常常不知不覺地充當這種論述的共謀；打破這種一致性是很困難的。

格拉斯：我對敘述型小說的理解，永遠是一確切地說，從《鐵皮鼓》起——從那些不創造歷史、但歷史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人的觀點講故事，他們是受害者或兇手、機會主義者、旅伴、被追捕者。這源自德國文學傳統。如果我們只依賴歷史學家的檔，肯定對勝利者所知甚詳；但是，失敗者的故事如果有，通常也寫得很不足夠。文學在這裡擔當了某種補缺作用，在必要的時候介入，使沒有聲音的人有機會說話。這也是你這本書的起點。

但你現在談的是電視，電視像所有宏大的機構一樣，已發展了它自己的迷信——收視率，收視率的命令必須服從。這就是為什麼在重要頻道上，像這樣的談話如果有，也是很少的，一般會出現在 ARTE（譯注：一個法德文化頻道）。就

連這次談話最初也是被北德意志電臺拒絕，然後不來梅電臺一狡猾地，就像弱者往往會做的那樣：這就是這類事情滑稽的一面——才溜進來，讓我們一起坐在我工作室的桌邊。

我們兩人都來自一個可追溯至中世紀的傳統，這就是爭辯的傳統。兩個人，兩種不同的意見，兩種互相補充的經驗。這樣，如果我們真正做出努力，就可以談出點什麼。也許我們可以向電視這個摩洛神提出一個建議：請回到就一個特殊主題展開批判性對話，像在爭辯中那樣，這是一種經實踐證明的形式。

布林迪厄：我想，我同意你的目標。然而，不幸的是論述的生產者——作家、藝術家、研究者——必須有一系列非常特別的環境，才可以再次佔用他們的生產工具。我刻意使用這些有些過時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因為，具有悖論意味的是，今天的作家和思想家已完全被剝奪了生產和傳播的工具，對它們不再擁有任何控制權，必須在簡短節目裡，用一切花招和詭計證明他們的論點。

格拉斯：不過，我們避免掉入抱怨的姿態。我們一直屬於少數人，當你審視歷史進程，令你震驚的是少數人可以產生多麼大的影響力。當然，必須想出某些戰術，尤其是計策，才可以使人聽到。例如，我覺得自己作為公民，就是被迫去打破文學的一個基本法則：“別重複自己！”在政治上，你得不斷重複，像一隻鸚鵡，重複你知道是正確的並證明是正確的想法，這真是令人疲倦——你不斷聽到自己的聲音的回音，結果是連自己聽起來也像鸚鵡。但這是這項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你想一個充滿不同聲音的世界找到任何聽眾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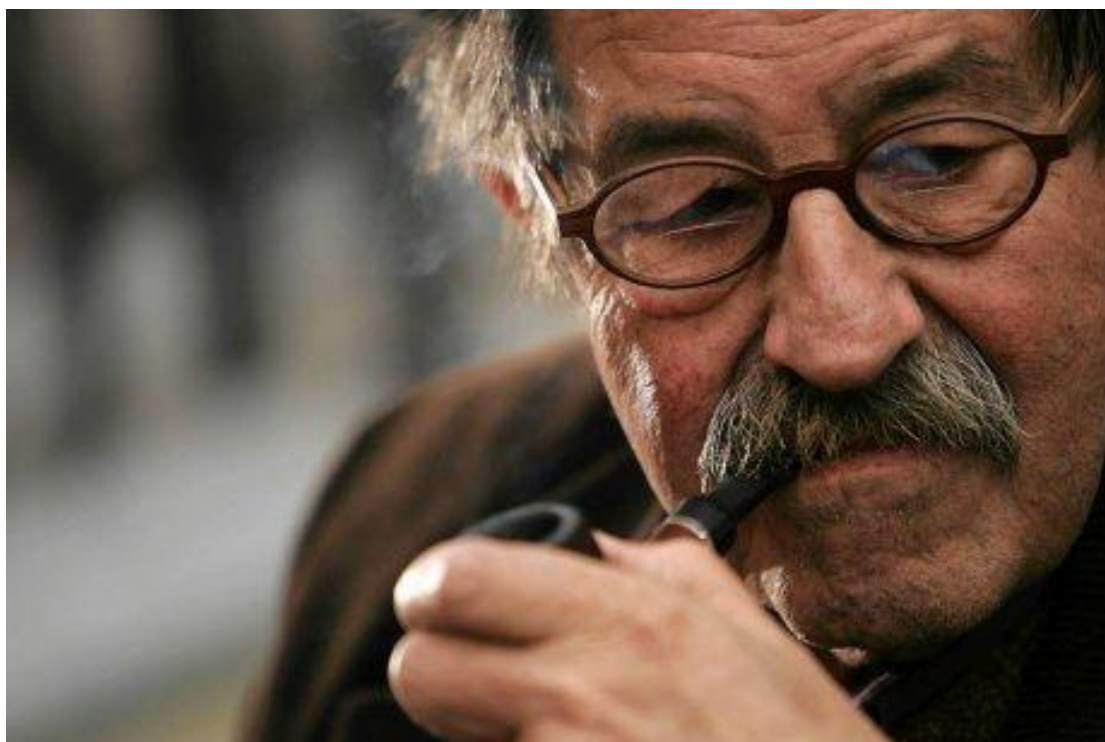
布林迪厄：在你的著作中——例如在《我的世紀》中——我所欣賞的是你尋找表達手段，以向一群數量很大的讀者傳達一種批判性的、顛覆性的訊息。但是，今天的情況與啟蒙時代的情況非常不同。（狄德羅的）《百科全書》是一件武器，

它調動新的溝通工具，反對蒙昧主義。今天，我們必須與各種全新形式的蒙昧主義作鬥爭——

格拉斯：但依然作為少數人。

布林迪厄：——這些全新形式的蒙昧主義之強大，是進攻啟蒙運動的蒙昧主義所無法比擬的。我們面對無比強大的跨國媒體公司，它們控制除少數領域之外的一切。哪怕是出版界，也變得愈來愈難以出版高質素的書籍。這就是為什麼我老在想，我們是否應該建立一個“國際組織”，由從事不同形式的研究的作家構成——不管是科學作家或文學作家或任何其他類型的作家。

格拉斯：是的，迴旋的餘地很有限。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使我很吃驚的事：我從未想到我有一天竟會要求國家扮演更大的角色。在德國，我們總是太受國家約束，它站在一切制度之上。在更民主的控制下，發揮國家的影響力，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現在我們發現自己跑到另一個極端去了。新自由主義採納了無政府主義最深刻的願望——當然外表上看不到絲毫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也即完全把國家拋開。它的訊息是：去它的吧，我們將從這裡接管。在法國或在德國，如果要實施任何必要的改革——我說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措施——那麼除非私有工業對低稅的要求得到滿足，以及除非得到經濟同意，否則什麼也不會發生。



布林迪厄：這剛好是把我較早時說過的話倒過來說。我們被悖論地引向捍衛並非完全可捍衛的東西。但是僅僅要求回歸“更國家”夠嗎？為了避免掉進保守革命設置的陷阱，我想我們必須發明另一種國家。

格拉斯：我強調一下，以確保我們不會彼此誤會：新自由主義理所當然只想擺脫國家那些影響經濟的活動。國家應該召集員警，加強公共秩序——這些不是新自由主義的事。但是如果國家被剝奪了管制社會階層的權力，以及被剝奪了對那些被排斥在生產程式以外或尚未加入生產程式的人士——不僅是殘疾者、兒童或老人——的責任，如果某種形式的經濟擴張可以通過逃入全球化來躲避任何責任，那麼社會就必須透過國家的干預來恢復福利和社會供應。不負責任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組織原則。

布林迪厄：在《我的世紀》中，你描繪了一系列歷史事件，其中有一些令我感動。我想到那個小男孩的故事，他到李菊克內西發表講話的集會上去，在他父親的脖子上撒尿，這肯定是一種發現社會主義的極具獨創性的途徑……還有你

對海德格爾的評論——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共通點，因為我曾撰文對海德格爾的言論進行過批判性分析，他的言論在法國造成嚴重破壞，直到最近。

格拉斯：法國知識份子對榮格和海德格爾的著迷，令我覺得好笑，因為它把法國和德國互相支持的陳腔濫調顛倒過來。這種曾在德國造成致命後果的糊塗思想，在法國竟會如此受推崇，實在荒誕。

布林迪厄：確實如此——就拿我自己來說，由於我毫不含糊地反對這種對海德格爾的新狂熱，所以非常孤立。在一個一頭撞進現代主義的蒙昧國家，做一個試圖恪守啟蒙運動信仰的法國人，真是毫無樂趣可言。在我眼中，一個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竟然為榮格塗脂抹粉，實在是可怖的事。

舉一個手邊的例子。恩斯特·凱西雷爾是啟蒙傳統最偉大的繼承者之一，但在法國知音很少，而他的重要對手海德格爾則無比成功。這種法德互換位置的情況，一直使我不安：我們怎麼可以肯定，法德兩國不是把它們最沒吸引力的方面綜合起來了？我總是覺得，基於某種歷史諷刺，法國人拿德國最糟糕的東西，德國人則拿法國最糟糕的東西。

格拉斯：在《我的世紀》中，我描寫一個教授，他在 30 年後的星期三討論會上反省學生時代對 1966 至 1968 年間各次事件的反應。那時，他出身於海德格爾那條路子的崇高哲學背景，最終他又回到這種哲學。但是，在這中間，他曾捲入激進主義浪潮，成為那些公開揭露和攻擊阿多諾的人士之一。這是對那個現在被簡稱為“1968”的時期的非常典型的描述。

我當時夾在所有這些事件的中間。學生抗議是有理和必要的，並且其取得的成果要比 1968 年那場假革命的代言者願意承認的多。那場革命並沒有發生，它沒有基礎，但社會確實轉變了。我在《蝸牛日記》中寫到，當我說進步是一隻

蝸牛時，我怎樣遭到嘲笑。口頭上大躍進當然可以辦到，但是你躍過的那個階段，也即處在你下面的那個社會卻不慌不忙，根本不想趕上去；你躍過社會，接著，當社會的情況反擊你的時候，你大吃一驚，把它稱為反革命——用當時就已搖搖欲墜的共產主義愛用的一個詞。人們對這點不瞭解。

布林迪厄：在 1968 年的運動中——就像在所有這類運動中一樣——實際上有幾種革命。有一種高度可見和火紅的革命，其特點頗有象徵性和藝術性，外表上很激進，由後來變得非常保守的人領導。接著，在較低的層面上，有另一些人，他們的要求在當時被認為是改良主義的——以及可笑的，他們要求改變教育方法、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們有非常溫和但實際的目標，並遭到如今成為保守派的那些人的鄙視。

格拉斯：在 1970 年代期間的德國和北歐，漸漸出現一種意識，認為如果允許經濟按當時的樣子繼續開採自然資源，環境最終就會被摧毀，生態運動應運而生。但是各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一如既往，仍然只集中于傳統的社會問題，完全繞過了生態問題，或把它看成有悖於它們的要求。左派工會主義者在其他方面都是進步的，唯獨相信一旦提出生態問題，就有可能失去職位——這種看法一直持續到今天。如果我們希望右派、新自由主義善用他們的才智，清醒過來，那麼也應同樣希望左派如此。必須明白，生態問題是不能與工作和就業問題分割的，所有決定都必須有利於環境。

布林迪厄：對，但是你關於生態主義者的這番話，也同樣適用於社會民主黨人。社會自由主義、貝裡雅主義、第三條道路——這些假髮明全都是詭計，旨在使被支配者把支配性權力的支配性觀點內化成他們自己的觀點。歐洲人在內心深處以他們的文明為恥，再也不敢維護他們的傳統。這個過程開始於經濟層

面，但逐漸擴展至文化領域。他們以自己的文化傳統為恥，他們對捍衛自己的傳統懷有一種罪孽感，這些傳統被當作是並被指責為過時的——在電影中，在文學中，在其他領域。

就說文化問題吧：當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很高興，不僅因為它授予一位非常好的作家，而且因為它授予一位敢說敢言、捍衛可能被其他人視為落伍的藝術取向的歐洲人。

格拉斯：就諾貝爾文獎本身而言，沒有它我也活得好好的，而我希望有了它我也可以活。有些人說“終於”，另一些人說“太遲”，但我很高興它在我這麼大把年紀、已過了 70 歲的時候被授予我。假如一位較年輕的作家，譬如說在 35 歲左右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會是一種負擔，因為這樣一來期望會太高。如今我可以抱著嘲弄的態度談論它，然而又是快樂地對待它。

我們應該提出一些不容易被忽略的建議。大電視臺也對誤導性的收視率崇拜無所適從。我們應該提供一點幫助，使它們走上正確的方向。在德法關係上也理當如此，兩國互相傾軋，幾乎使對方流盡最後一滴血，世界大戰和回溯至十九世紀的歷次戰爭給它們留下的傷口至今還可以看到，它們做出各種辭令上的努力，希望和解。你會突然明白，分隔我們的不只是語言障礙，而且是其他一些較少為人知的因素。我已經提到一點，也即我們甚至不能認識到共用歐洲啟蒙運動的進程。在民族國家占如此主導地位之前，事情是不同的。法國人注意德國發生的事，反之亦然；例如歌德翻譯狄德羅，兩國的一些團體之間有一定程度的溝通，兩國的少數人都反抗各自的審查制度，力圖傳播啟蒙思想。

現在是重建這些聯繫的時候了。我們必須把歐洲啟蒙運動留給我們的一以及它後來未能發展的一思想傳下去。除了以啟蒙運動的方法來改革啟蒙運動，

做出證明是必要的修改，別無其他選擇。雖然我們公開譴責新自由主義的霸道及其不負責任的領域是正確的，但我們也應考慮我們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出了什麼差錯。就像我已經說過的，處於後期形式的資本主義和處於初期形式的社會主義都是啟蒙運動的產兒，不管怎樣，他們需要再次坐到同一張桌邊。

布林迪厄：我覺得你有點兒樂觀。很不幸，我不敢肯定這個問題可以這樣提出來，因為我認為目前使歐洲不勝負荷的各種經濟政治力量是如此沉重，已把啟蒙運動的遺產置於危險境地。如果我們要阻撓我們更普遍地與“啟蒙運動”——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以及對這種進步的控制——聯繫在一起的東西被摧毀，我們就必須克服這個障礙。我們需要發明一種新的烏托邦主義，根植於當代各種社會力量，為此——冒著貌似鼓勵回歸老一套政治視野的風險——必須建立新型的運動。現存的工會是過時的組織形式，如果它們要實現目標，就必須變革、改造、重新定義，必須國際化、全國化，建基於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

格拉斯：你的建議是一種烏托邦。這等於是在根本上改革工會運動，而我們知道，要改變那個機器是何等困難。

布林迪厄：但這是一種我們可扮演一個角色的烏托邦。例如，法國的社會運動與數年前相比，影響力大減。傳統上，我們的運動具有一種強烈的工人觀點，對知識份子懷有很大、並非完全沒有理由的敵意。如今，由於它陷入危機，社會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更加開放，更加願意對批評做出回應，也變得更加深思熟慮。突然間，它更加隨時準備歡迎針對我們社會的各種新式批評，這其中也包括對它的批評。這些批判性的、有反省力的社會運動，在我看來就是出路。

格拉斯：對此，我有所懷疑。我們兩人都到了這種年紀，可以保證只要健康允許，我們將繼續敢說敢言。但是，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我不知道法國的情況怎樣——我猜好不了多少——但是在年輕一代的德國作家中，我幾乎看不到有繼續發揚敢說敢言、敢於承擔的啟蒙運動傳統的傾向或興趣。如果沒人來接替我們，那麼，完全可以說，屬於歐洲一個優秀傳統的這一部分，將會喪失。

（黃燦然翻譯）